

一支创始资金1000万元的公益基金高调揭牌，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这支名为“太阳雨”的由企业出资设立的公募型基金，被业内人士看作中国企业做慈善的新趋势。而对于企业来说，筹备基金的过程就是一次在“公益世界”中的慢慢成长……

一个“草根企业”的公益探索

特
别
报
道

本报记者 郑莉

10月28日，徐新建在6个月前许下的“承诺”终于得以兑现。他代表江苏太阳雨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捐出的1000万元有了“归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太阳雨公益慈善基金成立，这笔捐款成为该基金的第一粒“种子”。

接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所写“扶贫济困，创业帮富”的题词，太阳雨太阳能集团董事长、太阳雨公益慈善基金副理事长徐新建长舒了一口气。“6个月时间，甘苦自知呀，不过，终于等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局。”

据了解，致力于救灾助困和创业扶贫的太阳雨公益慈善基金，是一支契约型开放式非营利专项基金，即通常所说的“公募基金”，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为其主管机构。有关专家表示，这种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的由企业出资设立的公募型基金，在我国还属于“稀有品种”，“太阳雨”等公益基金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企业做慈善的新趋势：企业捐赠向专业化、组织化方向转变，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观念则由道德义务向战略选择转变。”

“不能让这笔钱‘死掉’”

如果贪图省心，徐新建原本可以按照传统做法，把1000万元放在公益机构里，设立一个专项基金。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和

团队用了6个月的时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开放式基金。

今年4月24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颁奖盛典的明星慈善晚宴上，徐新建以全场最高价207万元拍得20多位明星的手模，并且当场宣布增捐至1000万元，用于公益事业。

回到家里，徐新建看着“价值1000万元”的明星手模，心里琢磨开了：“我得找个信得过的基金会，把钱花到对的地方。”

“太阳雨公司每年用在公益捐资上的钱不少，可每到年底总结的时候，董事们却谁也说不清这些捐款最终用在哪里了。”太阳雨公益慈善基金秘书长王诚莹说，这个问题也在困扰其他热心公益的企业。

于是，徐新建派王诚莹“考察”了几家“国”字头的基金会，但基金会的态度都不怎么“热情”。“人家不缺钱，他们现在最头痛的是这些钱谁也不敢乱花，用在哪儿，怎么用都得请专业人士仔细规划。”

王诚莹从“圈子里”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在我国，公益基金因其使命和定位不同，命运和结果也各不相同。许多公益基金做得风生水起，但也不乏一些公益基金因为缺乏后续设计和专业管理而被打入“冷宫”，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王诚莹，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下设的基金项目大概有30多个，大部分都在发挥作用，有些还形成了品牌，比如春蕾基金等，不过的确也有基金因为种种原因被束之高阁。

“比如安利公司，几年前捐赠了100万元，在一个基金会里设立了用于资助艾滋病项目的基金，由于没有后续设计，该公司也没有持续注入新的资金，为了保留这个基金，基金会不便拿本金来设计项目，就这样搁置下来，至今100万元都没有派上用场。”

王诚莹把收集到的信息向徐新建做了汇报。一向“做事果断”的徐总立即拍板：

“咱们自己设个基金，找专业人士管理，不能让这笔钱‘死掉了’。”

“惟一的苦恼是时间长了点儿”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公益基金属于挂靠性质，不需要正式注册，其实不然。”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存在的公益基金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企业家或者企业进行捐赠成立，不接受其它捐赠，企业或个人独立执行项目；第二种类似于种子基金，接受其它捐赠，可以对外筹资；第三种是不进行注册，以基金形式运作，相当于一个公益项目。

徐新建看中了第二种公益基金形式，“我希望1000万元只是一粒种子，种下去生根发芽，然后吸引更多的人种下新的种子，结出更多的果实……”

“你在国内建立一个企业出资设立的开放式公益基金？异想天开吧！”企业界的朋友们摇着头否定徐新建的想法。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他也曾经想过自己建个公益基金，但一打听，手续太复杂，于是打了退堂鼓。

朋友们的话，徐新建没听进去。于是，王诚莹有了新的任务：搜集资料，研究国内外企业基金和专业基金会的运作方式，筹备新基金。

“说实在的，国内可借鉴的经验太少，我们还要摸着石头过河。”王诚莹跑了几趟民政部，打听申请注册基金的手续。“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政部工作人员告诉王诚莹，国家在审批基金的手续上非常严格，申报中需要提供的材料也很多。

首先，需要找一个主管单位。

于是，徐新建找到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该协会一直致力于倡导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协会领导痛快地答应了。“我们是幸运的，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如此幸运。”王诚莹说，对于许多希望设立基金的

企业来说，寻找合适的“主管单位”并非易事。

第二步就是准备繁杂的申请材料。“包括为什么设立基金、成立后如何管理，监管机构如何设置，资金从哪里来，怎么运作，最终要达到什么效果等许多内容，需要准备几十份材料，有厚厚的一大摞。”王诚莹用手比划着。

第三步，将准备齐全的材料交给主管单位审批，缺任何内容都要重新补充，然后重审。主管单位审核通过后，上交民政部。“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徐新建和王诚莹经过6个月的筹备和等待，终于收到民政部予以正式注册基金的回复。

“我们惟一的苦恼就是时间长了点儿。做企业的人，讲效率，什么都要快嘛。”但王诚莹说，他很理解有关部门的谨慎，“要设立一个基金，特别是开放式基金，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行为，而是政府的公信力、慈善事业的信誉，审慎是非常必要的。”

“以前对公益基金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后补的。”徐新建笑着说，在筹备太阳雨基金中，他们的企业在“公益世界”中慢慢成长了。

“我们是为了宣传公益精神”

据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设立基金已经成为备受企业青睐的参与公益慈善的方式。据调查，虽然目前中国有1000多家基金会，但有一半以上慈善家的捐赠，是通过自己的基金或者直接捐助的方式进行的。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太阳雨等公益基金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企业做慈善的新趋势：中国的企业家已告别了简单停留在捐赠层面的慈善思维，转而向专业化、组织化的方向发展，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观念也由道德义务向战略选择转变。

“只要太阳雨公司健康地存在，对基金的关注就不会削减，我们要付出全部力气去扶持基金的成长。”在太阳雨基金成立仪式上，徐新建慷慨激昂。但他心中也有隐忧：“一个‘草根企业’，能量再大，赚的钱再多，对于庞大的公益事业来说都显得微不足道，如何能够让基金健康成长？”仅凭单纯的热情还不够。

“企业公益基金是非营利性质的，‘非营利’这三个字表示组织本身不以赚钱为目的，而以实现某种公益目标为使命，为了实现使命，更需要对基金善加管理，以用于资助和开展各种活动。”有关人士表示，随着市场竞争对企业成本压力的不断加大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不断提升，提高公益基金的管理经营能力和专业化水准，让基金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成为许多热心公益的企业必须面对的门槛。

而太阳雨基金，可以说是企业做“专业化公益模式”的一次探索。

据了解，太阳雨基金设立了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日常管理和运作。理事会作为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向所有基金捐助人负责，并接受舆论监督。理事会设有7至11名理事，均来自民政部、捐助方、著名企业家、专业管理人才和社会上的贤达人士。“基金以诚信、透明、效率、民主为基本原则，接受政府及公众的监督，并将及时在媒体上披露相关捐赠信息。”王诚莹说。

虽然属于“公募基金”，但徐新建表示，他的最终目标并非募集更多的钱。

“太阳雨基金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向更多的企业传播公益理念，在社会上倡导公益精神。只有每个人都认识到公益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做一点点慈善，社会就会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这样，我们的1000万才真正用对了地方。”徐新建黝黑的脸膛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红顶商人”的黑色人生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晓磊 朱薇

重庆“打黑大审判”进入第三周，备受关注的“红顶黑老大”黎强团伙涉黑案近日开庭审理。

黎强令人震惊的双重身份被公诉人一一揭开：表面上，他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成功企业家，掌控着重庆主城区近20条客运线路，满身荣誉，风光无限。实际上，他是主使多起砸车、斗殴事件的“车霸”，重庆主城区多次交通大瘫痪的“祸首”，多起上访事件的幕后“黑手”，并腐蚀拉拢了运管、信访、税务等多个部门的官员。

黎强是重庆“打黑除恶”的典型人物之一。这些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究竟如何从“江湖混混”一步步发展为“一方恶霸”？他们又是如何在政治上“染红”、在经济上“漂白”的？

覆灭在“转型”前的“红顶黑老大”

一副黑框眼镜，头发花白，面色灰暗，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黎强，完全看不出昔日“红顶商人”的风范。他被控9项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行贿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起诉书长达3万多字。

据公诉人指控，自2000年以来，为确立在重庆客运市场的强势地位，黎强以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托，采取经济利益笼络控制等方式，纠集何永红等人，逐步形成了以黎强为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非作恶，称霸一方。

事实上，黎强不过是重庆市近来被揪出的众多“霸王”之一，此外还有米霸、肉霸、菜霸、面霸、矿霸、渣霸……盘踞在重庆的建筑工程、土地拍卖、矿产开采、交通运输、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甚至粮食加工、商品零售、渣场等多个领域。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黑恶势力装备精良，不仅拥有大量砍刀、弓弩等“冷兵器”，而且装备有长枪、短枪、手雷等枪支弹药。重庆警方今年6月曾挖出一处“兵工厂”，其中有仿制前苏联“AK47”的五六式冲锋枪2支，同时还有德国PP手枪、捷克CZ75手枪等。一些黑恶势力还拥有先进的制毒设备，能在较短时间内制造出毒品。

一些黑恶势力的“章程”肆无忌惮。黎强召集组建的“共创公司”，其公司章程就明文规定：如公司董事因执行公司事务、执行董事会决议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被拘留，则其他董事每人补助被追究者人民币200万元作为补偿。

依靠“黑色规则”，黑恶势力积累起巨大财富。以黎强团伙为例，公诉机关指控其参与非法经营1.2亿余元，违法所得5711万余元，逃避缴纳税款6224万余元。

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的利益链条

在法治社会里，黑恶势力如何能从“江

湖混混”发展到称霸一方？从重庆“打黑”的成果看，几乎每一个“黑老大”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多个“潜伏”在党政干部、政法干警中的靠山。“黑老大”们用金钱女色、重首重饰、名家字画、古董牙雕等收买极少数不法干部，形成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

在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检察机关目前已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7件共52人，其中厅级干部10人，涉及政法干警29人，涉及税务、工商、交通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8人。重庆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王诚莹，重庆市北碚区原副区长赵文锐，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原庭长乌小青，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原总队长陈洪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等一批干部“落马”。

一年多来控告黎强的受害者告诉记者，黎强曾当众表示，“随便你们到哪里去告，到处都是我的‘兄弟伙’”。他以金钱铺就了利益输送链条，其终端通向重庆多个政府部门，其中手握营运指标和非法营运查处权的运管部门更是其“主攻对象”。沙坪坝区运管所肖庆隆，放任渝强公司17辆黑车非法营运，帮助黎强获得249万余元非法利益。黎强则许诺肖庆隆“入干股”共同经营，分两次给肖庆隆银行账户上转款48万元。

税务部门也是黎强投放“糖衣炮弹”的重点。2009年2月，黎强为逃避税务检查，将重庆市地税局稽查科原科长曾安东约到家门，向曾安东行贿10万元。曾安东则积极将渝强公司的部分会计资料、初步检察结果泄露给黎强。2009年6月16日，在曾安东的帮助下，渝强公司仅补缴税费及滞纳金15万余元，便掩盖了偷税数千万元的事实。此外，黎强对信访部门也发动金钱攻势，依靠信访干部的台前协调，幕后指点，制造集体上访事件，以此获取车辆营运指标。

经济上“漂白”形象上“贴金”

重庆黑恶团伙积累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积极谋求“成功转型”，主要是三种手段：一是经济上“漂白”，以非法所得进军合法行业。二是形象上“贴金”，摇身一变成为冠冕堂皇的“成功人士”、“慈善人士”、“红顶企业家”。三是政治上“染红”，千方百计博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寻求“保护伞”。

黎强头顶的“红帽子”就有一大堆：重庆市人大代表、巴南区政协常委、区工商联会长、市道路运输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等等。黎强手下的渝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永红，也拥有巴南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头衔。

检察机关透露，涉黑的重庆江洲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明亮，在通过容留吸毒卖淫、经营赌博洗码公司、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敛财数亿元人民币后，开始积极“转型”，进军房地产业、建筑材料、古玩、仪器仪表等领域，俨然一副“成功人士”模样。

黑恶势力常常打出热心公益事业、注重个人修养的幌子，表面上力图与主流价值观相适应。黎强、陈明亮、岳宁等涉黑人员在被捕前都有从事慈善活动的经历。重庆国程公司董事长岳宁就参与创办助学奖励基金和希望小学。他一面经营卖淫场所，一面打造“光鲜”的个人形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自己“想做一个雷锋式的好人”。

清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

“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三种颜色。”长期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陈世伟总结说，第一是“基因色”黑色，即通过有组织的暴力控制和非法手段，与常态社会对抗；第二种颜色是“保护色”红色，即寻求常态社会对自身的庇护，拉拢干部，侵蚀公权力；第三种颜色是“最高颜色”无色，当黑恶团伙发展到这一阶段，最具欺骗性，其犯罪行为危害最大，也最难察觉。

陈世伟认为，重庆一些黑恶团伙就处在向更高级别“转型”的阶段。重庆依法雷霆打黑，阻断其“转型”之路，正当其时。

为铲除黑恶势力，重庆公安机关对涉黑涉恶案件采用ABCD分类挂牌督办，聘请律师参与重点案件办理，为自己找漏洞、挑毛病。重庆检察机关出台保证案件质量的规定，对罪与非罪、一般案件和涉黑案件严格区分。

重庆警方表示，在办理涉黑恶案件时，绝不压低也绝不拔高，打击面绝不缩小也绝不扩大，确保指控的每一起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准确，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税务部门也是黎强投放“糖衣炮弹”的重点。2009年2月，黎强为逃避税务检查，将重庆市地税局稽查科原科长曾安东约到家门，向曾安东行贿10万元。曾安东则积极将渝强公司的部分会计资料、初步检察结果泄露给黎强。2009年6月16日，在曾安东的帮助下，渝强公司仅补缴税费及滞纳金15万余元，便掩盖了偷税数千万元的事实。此外，黎强对信访部门也发动金钱攻势，依靠信访干部的台前协调，幕后指点，制造集体上访事件，以此获取车辆营运指标。

经济上“漂白”形象上“贴金”

重庆黑恶团伙积累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积极谋求“成功转型”，主要是三种手段：一是经济上“漂白”，以非法所得进军合法行业。二是形象上“贴金”，摇身一变成为冠冕堂皇的“成功人士”、“慈善人士”、“红顶企业家”。三是政治上“染红”，千方百计博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寻求“保护伞”。

黎强头顶的“红帽子”就有一大堆：重庆市人大代表、巴南区政协常委、区工商联会长、市道路运输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等等。黎强手下的渝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永红，也拥有巴南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头衔。

检察机关透露，涉黑的重庆江洲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明亮，在通过容留吸毒卖淫、经营赌博洗码公司、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敛财数亿元人民币后，开始积极“转型”，进军房地产业、建筑材料、古玩、仪器仪表等领域，俨然一副“成功人士”模样。

道德观察

把心放正，说的话自然不会雷人

■李瑾

继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替谁说话”的雷人之语，近来流传甚广的“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广受抨击。这句牛言日前已找到“出处”，他便是广州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尽管不是之前媒体揣测的广州市政府官员，但也属于公共事业服务领域的一位领导干部，面对记者追问封闭道路是否该事先告知市民，而出此雷语，真是有失身份。

从“替谁说话”到“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一句雷语倒雷公众，也令当事人事业前途黯淡——逯军至今仍被“停止工作，在家反省”，而广州的这位干部亦遭停职。

与这种雷人语录相对，还有一种语言，尽管没有歇斯底里的轻狂，但却言之无物，被老百姓称为永远正确的废话，这就是自成

一体的官方语言体系。官话不仅让群众难以接受，也让一些干部自身感到痛苦。近日，江

苏睢宁试图打破这种语言体系。睢宁县发布《关于会议讲话强制终止制度的意见》，对流

行于会场上的“正确的废话”说不。这是该具

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开始后，第五

次出台相关红头文件。

此外，当地还对干部

提出了包括“谁说的你找谁”、“你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等在内的63句禁忌语言。

说话，有水平高低，也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素质。

对于公职人员来说，说好话，说水平的话，

说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话，已经不仅仅

代表了个人素质，更代表了个别政府部门或

者公共事业服务